



北京市农业生产跃进丛书

畜牧业生产经验

(一)

北京市农林水利局編

北京出版社

张
英
宏

16.62

5.8

畜牧业生产经验(一)

北京市农林水利局编

北京出版社出版(北京东单廊子胡同8号)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99号

建筑工程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图本: 787×1092 $1/32$ · 印张: $14/16$ · 字数: 17,000

1958年12月第1版 195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: 1—7,000册

统一书号: 16071·31

定价: (7) 0.10元

前 言

1958年全国工农业生产全面跃进，北京郊区的农业生产也有了很大跃进。一年来，郊区二百八十万农民在党的领导下，解放思想，破除迷信，鼓足干劲，力争上游，多快好省地跃进再跃进，获得农、林、牧、副、渔全面丰收。为了迎接更大的丰收，組織更大的跃进，我們把郊区农业生产中的跃进事迹和先进經驗进行了初步的整理，刊印出来，供各地各社参考。但是由于時間仓促，調查了解得还不够深入，难免有遺漏或疏忽之处，希讀者多指正。

1958年12月

目 录

山区发展养鹅事业的先锋..... (1)

北京鸭生产大跃进..... (6)

奶牛卫星——北郊农场的“北京一号”

八个半月产奶二万五千多斤..... (12)

大牲畜配种繁殖满怀区——周口店区..... (17)

周口店区石窝乡大牲畜繁殖工作是怎样开展起来

的? (23)

山区发展养鸡事业的先锋

——北京市龙泉寺家禽场的经验

(一)

龙泉寺家禽场，在北京市昌平区西南部的老爷山上，它的主要生产任务是养鸡，因而又被称为老爷山养鸡场。

这里，原来是一片多見树木少見人的荒山，面积約有3,800多亩，除去可耕地400多亩以外，其余尽是山坡野草。原有的破庙房屋60間，也都年久失修、坍塌倒坏。龙泉寺家禽场在党提出的大量发展家禽事业的号召下，为了不占耕地面积，充分利用山区，試行羣鸡放牧，开辟山田，节省飼料，特选定在这里建立的。

可以想象，在这上不着村、下不着店的遍野荒山上，既无工程师又无技术員，况且运输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进行建场，該是多么艰巨的工作啊！可是，由于上级党政领导的重視和支持，280名下放干部以劳动鍛煉的坚强毅力和力爭紅專的決心，發揮了冲天的干劲，並沒有讓任何困难擋住他們前进的道路。

从今年3月开始，首先集中力量突击建房，随后本着边建设、边生产，盖一栋房养一栋鸡的原则，逐渐转入了生产。截至11月底，这个白手起家的养鸡场已建成新房舍400多间，育成鸡76,000多只。养鸡事业在老爷山上生了根、开了花、结了果。

(二)

全场现有职工296人（下放干部280人），除农业队、基建队外，在养鸡方面按成鸡、中雏、小雏、放牧等阶段分设了七个生产队，队下分组，饲养员分片包干进行管理，每个人管理的定额是：成鸡600只，中雏1,000只，小雏1,500，放牧1,500—2,000只。

小雏分伞育和笼育两种。笼育舍的鸡舍内的木笼有五层，有的六层，好象高楼矗立，笼里育满了小雏，靠窗生着一个煤火炉，炉旁放着一大盆热水，温度计的红线停留在华氏75度。笼育小雏，最初需要室温92度，每隔10天降5度，降至正常室内温度75度为止。炉旁的热水盆，是为防止室内干燥而设置的。但是光靠保温不能解决问题，更重要的是经常通风换气，小雏才能正常发育。育雏最成功的经验是：饲养员同志们做到了“人不离鸡，鸡不离人”以体验室内温度和观察鸡的动态。场子里有一套简要的“养鸡守则”：

“育鸡如育婴，给鸡作母亲。

心耐复细致，贯彻精气神。

温度即准确，空气又清新。

晝夜勤检查，專看鸡表情。

預防脏治疗，严格搞卫生。

消毒要彻底，及时作分羣。

喂食有定时，分量要弄清。

大家訂公約，一齐来遵循。”

这个守则概括地总结了飼养管理的一切措施。这也就是第一批育雛成活率所以能达到93%的具体保証。

籠育小雛是苏联的先进經驗。傘、籠两种育法比較，籠育的优点較多。籠育可以提高房屋利用率，特別是在山区建房困难的情况下就更有积极意义。分籠飼养，便于隔离和分羣，不易傳染疾病或挤踩伤亡；不垫褥草，发育均衡，增重較快，但因在籠內第一次吃食較困难，所以又必須采用两育法：即小雛脫壳后，先傘育五天，然后上籠。这样能使小雛很快認食。

五十天以上的中雛，都圈养在新建的鷄舍里。中雛，是发育骨骼最重要的阶段。在这个阶段里，必須給以充分的营养、新鮮的空气和足够的运动，才能迅速发育成長，因此，飼养中雛是比較复杂的过程。飼养員同志們在这方面也摸索了不少經驗，其中最重要的是喂食，起初每天喂4次湿料，随着发育成長，食量不断增加，喂食时常常发生拥挤爭食、踩伤压坏現象，强者吃的快，弱者吃的慢，甚而吃不飽，結果强者愈强，弱者愈弱，造成发育不平衡。根据这一情况，飼料的喂法改为湿料干料两飼法，即每天喂两次湿料，常备干料，任其啄食。这样，就扭轉了上述缺点。其次，在管理工作上，还做到了保持室內空气流通、地面干燥，环境和用具清洁，喂食时观察鷄的动态、食欲和糞便正常与否等等。

中雛是剛剛离溫的小雞，若管理不善极易感染疾病并傳遍全羣。为此，除在預防方面采取了定期車間消毒、用具消毒和內服外用藥物并进行雞瘟預防注射等措施外，还在場內建立了一所雞病院，对病雞进行隔离治疗，病愈后再回本舍。

(三)

山区大量放牧，是养雞业中的空前創举。目前，在北京來說“只此一家”。雞羣紀律性很强，每天放牧归舍时，只要飼养員一声哨响，两千只雞馬上行动起来，非常省事。

在放牧队有两种不同的雞舍，一种是木制油毡頂活动舍，据說每个造价60元，可养雞90只，它的优点是能够任意移动，这一块牧地上的野草被雞吃光后，可以馬上移到另一处新鮮場地去放牧；再一种是用荆芭竹杆抹灰頂的固定舍，每个造价才12元，虽不能移动，但它的造价經濟，建造方便。

放牧可以节省飼料。全場共放牧中雛16,000只，如以同等日齡圈养，每月需要飼料7万9千斤，而放牧只需要5万7千斤就够了。另外，放牧的雞，随时随地能找到昆虫和甲虫吃，大大地节省了骨粉、魚粉等动物質飼料，并且还能消灭虫子对农作物的危害。

由于放牧能得到充分的运动，所以雛发育非常显著，这里的雞一个个体質健壮，羽毛光泽整齐。据說它們不但沒有发生过一般疾病，而且还增强了抗病能力。有一批雞初下到放牧队时，很多患有咳嗽病，經過七、八天后，大部好轉。

按照慣例，一般中雛要養到150天日齡才能下蛋。可是，这里的鷄，因为从育雛到中雛，从中雛到成鷄一直在良好的管理条件下成長，从未受过災害，所以，它們能够打破常規，提前在121天日齡就开始下蛋了。在秋天換羽时也沒有停产或減产。

深山內免不了掉豺狼虎豹，很多同志为小鷄的生命担心，可是，老爷山上的鷄羣从未受过野兽的危險。这并不是僥幸，也不意味着这山里没有野兽，而是場里巧有安排。每个生产队都配有猎枪，并按野兽的习性，在一定地点設有捕籠。

利用山区以放牧办法大量养鷄，是大跃进声中的新創举，集体养鷄成活率达到93%，更是从来没有的奇迹。老爷山是山区发展养鷄事业的第一块障地。这块障地首先被龙泉寺家禽場所占領，而且打了第一个胜仗。龙泉寺家禽場可以說是山区养鷄的急先鋒，同时它还打破了集体养鷄死亡率必高的保守思想，为人民公社集体养鷄生产提供了先进經驗。

北京鴨生产大躍進

——朝阳区幸福农业社的經驗

(一)

幸福农业生产合作社（現为高碑店人民公社一个站）位于北京近郊工厂林立丛中，地少人多。全社有31,578口人，却只有53,362亩地，每人平均1.68亩。可是，該社在党总支的领导下正确地贯彻了：为首都服务，增产更多的蔬菜、乳、肉、水果，供应首都的生产方針，大量发展了中外馳名的“北京鴨”。从1956年7月的700支鴨雞基础上，1958年发展到31,075支，增加43倍。只今年10个多月就供給首都23,000只鮮嫩肥美的填鴨。因之，保証农业社增加了收入。养鴨收入1957年是48,128元，占全社总收入的4%，1958年到10月底是85,398元，占全社总收入的8.9%。

“北京鴨”是世界上著名的肉用品种，原产于北京。一般生長60天可达3斤半重，經人工催肥，再經過16—18天可增重到5—6斤，就可供应市場，制成有名的“北京烤鴨”。

(二)

为什么幸福社发展养鴨这么快，这么好？他們的經驗

是：党委加强领导，发扬了敢想、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；以贫农为骨干，白手起家；制订合理的“三包”管理制度；有一套土洋结合的饲养经验。现述如下：

（一）党委加强领导，发扬敢想、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，打破养鸭“神秘论”。

市、区委曾多次指出：在郊区要想巩固农业社，增加社员收入，必须贯彻为首都服务的生产方针。1956年7月和11月，他们分别买进700支小鸭雏，发展养鸭。当时，有的干部信心不足，不信能养好鸭，社员冷言冷语，有严重资本主义思想的干部李文贵打击大伙说：“养鸭不赚钱，反正井里打水河里倒，赔大伙的去吧！”（此人后被开除党籍）乡党委没听这些流言蜚语，坚决贯彻市、区委指示，选择了六名贫农，曾经养鸭多年的人当饲养员。乡党委还专门研究了养鸭问题，决定：“打破养鸭神秘论”，并派党员副主任杜永福专门领导养鸭。

党总支书记邵文杰、委员马洪锦经常到鸭厂去了解思想情况，帮助解决问题。副主任杜永福59岁了，整天也不离鸭子房，鸭子饲料水草没有了，杜永福跑遍北京四城、郊区，还到河北境内找水草。党总支经常注意社员思想动态，刚办起鸭厂，没技术的社员怕养不好鸭，不好学，党总支就鼓励帮助说：“干什么也没有三天利巴头，困难架不住学习”。东厂只有李宽一个人懂技术，四、五个社员是生手，社里就请了六个社外的技工来指导，这样就更激发了社员钻研技术的决心，起早睡晚，大伙都睁大眼睛学技术。因此，以往需要学几年的养鸭技术，经过社员日、夜苦战，党员崔凤英和

社員段家訓、刘文起、刘文善等只用半年就基本掌握了养鴨的技术。全社两年里培养的养鴨員有20多人，“养鴨神秘論”打破了。

这时，党又通过杜永福对社員不断进行政治教育：养鴨不仅能增加社的收入，更重要的是可以出国換鋼材。在农村进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时，养鴨厂的社員都站稳了立場，通过鳴放辯論，思想觉悟更有进一步提高，許多人更坚定了养好鴨的信心，耿宝山說：“过去养鴨吃不上，穿不上，顧了鴨子吃口粮，顧不了人吃口粮，入了幸福社才真登了天堂”！今年5月，鴨子房又采取了大字报的民主形式，貼出大字报有80多張，有批評、意見、表揚和表示决心，东厂的社員集体写了保証書，要做到：一、保証遵守劳动紀律，不迟到，不早退，不无故請假，服从領導。二、保証完成10,500支肥鴨任务。三、保証質量，每支达到5—6斤，一等品占40%，二等品30%，三等品30%。到10月底，他們就提前完成今年10,500支肥鴨任务。政治掛帅，带来肥鴨丰收。

（二）以貧农为骨干，白手起家办厂。

1956年剛一办鴨厂，共有6个社員参加，他們是：史錫庆、史錫珍、李寬、郭增、吳桂林、李文荣，都是貧农。办鴨厂特別坚决，后来，二年来陸續吸收的28个社員中，有20个人都是貧农，党总支和农业社認真貫徹了“依靠貧农，团结中农”的办社方針。58年扩大鴨厂时，沒有鴨子房，社里就因陋就簡的把17間牲口棚改为鴨子房。在任何政治运动中，都先启发貧农，提高觉悟，因此，貧农社員表現着：技术毫不保留，劳动埋头苦干，成为生产中的坚强主力。貧农

史錫庆有40年养鴨的經驗，入社后，他把以往的經驗——用土炕代替孵化器孵鴨的方法，毫无保留地交給了社員，这种方法簡便，节省投資，用此方法，1957年孵鴨7,800支，1958年上半年孵鴨5,000支。貧农社員牛凤学，从来吃苦在先，任勞任怨，一天熬16鍋鴨子食（每鍋240斤）共約3,840斤，晚上累的爬不上炕，可从不叫苦，他說：“鴨子房是我的家，鴨子是我的命，它們吃多少，我熬多少。”62岁的史錫珍从1956年7月2日到鴨厂，两年来一天沒歇过工，他看管的400支种鴨，从沒无故損失过。所以社員都說：“貧农和社一条心，干活勤快不爭分，鴨厂是家鴨如命，年产1万才順心”。結果，两个鴨厂都超額完成了年产1万支肥鴨的計劃。

（三）在鴨厂內制訂“包工、包产、包飼料”的三包办法。

1957年，由于經驗不足，在养鴨厂只是把勞力按技术、政治条件分級記死分。1958年，鴨厂在党总支的具体帮助下，改变了这种方法，实行“包工、包产、包費用”。具体的作法是：按照种鴨、中鴨（生長25天以上至60天的）、填鴨（从60天至80天的）、雛鴨（25天以下的）四种，确定飼养員專职負責，每个飼养員可負責种鴨200支或中鴨800支或填鴨100支、雛鴨1500支，管理方面包括：調制飼料、墊圈、洗澡、保温放风。在中鴨長够60天即进行填鴨，飼料的比例是：油麦面占30%，玉米面占30%，高粱占20%，高粱糠占15%，豆餅面占5%，混合一起，制成每个一两重的填剂。用量是：1—3天填6个，4—6天填7—8个，7—12天

填9—11个，13—18天填13—15个。飼养管理时記固定工分，在填鴨时，專人負責，每天一級社員一天填150支，二級填100支，学徒工填50支，填时鴨子一般在3斤半重，要求填20天达到5斤半重，10天增一斤，达到这个标准，每填一支記五分。填好一支鴨子只供应23斤粮食。

这个“包工、包产、包飼料”的方法，有力的刺激劳动积极性。用社員的話說：“人人比，个个賽，这回有鋼使到刃上，有問題也不埋在碗底”。三包的好处是：

1.使劳动者参加了管理，加强了社員責任心。以往干活听队長的吩咐，現在都积极主动，每天5点鐘就起来，个人負責自己的鴨羣放风、清圈，都想办法搞好自己的鴨羣。

2.节约了劳力。东厂1957年22个飼养員負責2,300支鴨子，平均每人145支，而1958年同期17个人却負責4,410支鴨子，平均每人259支，劳动效率提高近一倍。搶活干成了风气，有人說：“計时活稀松，計价打冲鋒”。負責母鴨的史錫珍、吳国順1957年只管270支母鴨，今年母鴨增到400支，他們还認為有潛力。

3.鑽研技术、改进工具之风兴起。許多社員早来晚走，細心鑽研技术，一年里有8个人基本学会了养鴨技术，东厂还建立了研究制度，凡是出了事故，共同分析原因，提高技术水平，他們并試用填鴨器和控剂子器，改进了技术。

4.节约了粮食。按定量每支鴨填好需23斤，但实际上經過加工拋制飼料，有21—22斤，就可以填好一支5斤半重的肥鴨。一年来，共节约粮食很多。

5.死亡率降低，在夏天基本消灭了热死鴨子現象，并

且，原訂肥鴨一等品由60%上升到80%。

(四) 研究出一套系統的“土洋結合”的飼養辦法。

在他們養鴨方法上，沒有迷信洋經驗，而是根據當地條件摸索出一套“土洋結合”的辦法。飼養有標準、有制度，飼料的配合和給量都根據不同發育階段來規定，隨時關心健康情況，靈活掌握。如對雛鴨的飼養，每晝夜規定喂四次，出壳後36小時內不給食，7日內喂給煮熟的小米和浸泡的綠豆餛，一周後加20%的水草或白菜，以後逐步增加。對填鴨在8天時要加大填劑，根據春秋四季、肥瘦不同適當掌握：對中鴨為了促進其發育，飼料以90%熟玉米加10%綠豆餛。因此，雛鴨羽毛鮮亮，中雛肥的快。

他們對雛鴨很重視，在出壳期的溫度，經常把初出壳的小鴨草圈放在火炕上，掌握出壳越晚的靠炕頭越近的原則。有時還把圈放在架上，讓幼雛不受凍害。掌握溫度很重要，在夏天填鴨時，要有涼棚，用爐灰代替墊草，溫度保持在華氏60—75度間，以免熱壞。

鴨子要經常洗澡，夜間放好水盆，給鴨子一定的水喝。這些都是他們在實際工作中總結出來的好辦法。

(三)

雖然，在養鴨工作上有一定的躍進，但是他們還要爭取59年更大躍進。59年，幸福公社計劃養鴨達到18萬支，其中種母鴨是3,600支，當年可供首都需要的肥鴨是13萬支。

(朝陽區人民委員會)

奶牛卫星——北郊农场的“北京一号”

八个半月产奶二万五千多斤

要是称得起卫星，当然就不简单。拿郊区的奶牛来说，一般的也不过是平均每日产奶20多斤，多的是30多斤，再好也不过50多斤。可是北京一号呢？却远远地超过牠们，牠每天的产量总要在100斤上下，也正因为如此，才有卫星的称号。你要是从外表来看，北京一号没有什么出奇的地方，看起来牠是满身的黑白花，长长的尾巴，块头儿比一般的小奶牛大了些，但要比大块头的奶牛也不见得有啥出奇，奶房好似是大了些，严格地讲，也不出奇。可是要说起牠的产奶量来你总会不相信，也许会叫咋舌，从1958年2月18日起，到10月底的统计，在256天当中，先后总共产奶25,520斤，按天平均计算，一天产奶100斤，在3月24日那天，牠的产奶量一天之内跃增到130.5斤。北京一号可贵之处是牠的奶量均衡，保持高产。牠可以经常供应一百多个婴儿每天吃奶。

北京一号并不是生下来就叫北京一号的。过去，牠被资本家喂养着，没名没姓，只有被榨取，在那个年月里，牠的产奶量并不高，也只不过比一般奶牛的产奶量略高一点罢了。1956年，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来了，北京一号解放了，牠到了北郊农场，社会变了，人变了，牛也变了，说也奇怪，北

京一號的產奶量升高起來了。嚴格地講，沒有啥怪的，在過去，跟着資本家，資本家是沒有良心的，他們只知道剝削、榨取，當然喂養差，管理不當，產奶量又怎能高呢？高產的時候，也不過是每天產60—70斤的奶，到了社會主義的大家庭里，情況變了，有專人管，草料足，管理的周到，產奶量才逐步地高起來。

說起來，北京一號的年歲並不大，牠是1952年秋天降生的，到現在也不過是剛剛滿7歲。今年，牠已經是產第四胎牛犢了，也就是說牠已經是第四個產奶期了。第四胎的產奶，更不平凡，產奶量均衡上升，農場里一心要把牠產量指標提高，場子里提出了年產奶計劃是26,000斤，爭取達到36,400斤，趕上或超過世界上先進的產奶水平。從現在來看，年產26,000斤是綽綽有餘了，達到爭取指標也是有把握的。北京一號一年產奶3萬多斤，意味着什麼呢？這就確切地說明着北京市的奶牛在大躍進着，在飛躍地前進着，說明奶牛的產奶潛力是大有可為的，說明只要敢想敢干就沒有做不到的事情，也說明一頭奶牛在一年內可以為國家、為社會主義創造一萬元的財富，要是折合成原糧的話，可以頂得上10萬斤以至15萬斤呢。

北京一號的高產並不是偶然的，主要是有了黨的領導和支持，有了細心耐心的飼養員。場里黨委、行政、工會都關心着北京一號，關懷牠的健康，關懷着牠的產奶情況，都把牠當做掌上明珠，只要北京一號的飼養員——張明玉一提有關北京一號的問題，沒有不解決的。草料專門供應，簡直是要啥給啥，他們的目标是——高產，放出衛星來。同時黨和工